



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建设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秦汉统一战略研究



黄朴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秦汉统一战略研究



黄朴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统一战略研究/黄朴民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08649-1

I. 秦…
II. 黄…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秦汉时代
IV. K23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1364 号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秦汉统一战略研究
黄朴民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规 格	150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 插页 1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4 00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导 言	1
第一章 秦汉统一战略的时代特征	4
第一节 “大一统”理念与秦汉统一的文化基石	4
一、“大一统”的蕴义	5
二、“大一统”观念的缘起	6
三、《公羊》学的大一统观	8
第二节 何休“大一统”理论的内涵及其特色	11
一、何休“大一统”理论的层次与特色	11
二、何休“大一统”思想的价值与局限性	18
第三节 “大一统”原则规范下的秦汉政治与文化	19
一、学术文化的统一	19
二、制度文化的统一	23
三、虚拟历史现象为“大一统”张目	23
四、秦汉民族观念所体现的“大一统”理想	24
五、秦汉各类文化创造活动中的“大一统”情结	24
第四节 “大一统”与秦汉历史文化地位评价	25
一、贬低秦汉“大一统”历史文化地位的理由 不能成立	25
二、客观辩证地认识秦汉“大一统”历史文化的 地位与意义	28

第二章 秦汉统一战略的思维方式与地理因素	30
第一节 秦汉统一战略的思维方式与特色	30
一、“用中适时”与统一大势的认识	30
二、“守经用权”与统一战略的运作指导	32
三、“夷夏一体”与统一战略的民族意识	34
第二节 地理环境与秦汉统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36
一、地理环境为秦汉统一提供了优越条件	37
二、农耕文明是秦汉统一的深厚基础	40
第三章 以统一为主题的秦汉军队建设与国防设施	48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军队	48
一、骑兵时代的来临	48
二、统一集中的军队领导体制	51
三、“三位一体”和“居重驭轻”	52
四、从征兵制到募兵制	53
五、从刺史领兵到坞壁林立	55
六、习战阵之仪——秦汉军队的训练	57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武器装备与国防	59
一、钢铁兵器的广泛使用	59
二、军事工程奇迹——万里长城的修筑	60
三、军事交通与军用地图	63
四、武库的普遍设置	66
五、移民实边与军事屯田	67
第四章 建立在统一战争平台上的秦汉兵学	69
第一节 秦汉兵学的建树与特征	69
一、兵书的整理与校订	70
二、兵书的分类与学术价值总结	71
三、兵学表现形态的多样化	72
四、兵学学习的普遍化	73
第二节 《黄石公三略》所体现的“大一统”战略文化	74
一、《三略》的时代精神	75
二、注重探求攻略的转变	76
三、重视驭将治军的底蕴揭示	78
四、《三略》的战争观念与战争指导	80

第三节 学术兼容与兵儒合流	83
一、战国后期的兵儒合流端倪	84
二、两汉大一统背景下的兵儒合流趋势	86
三、兵儒合流的表现应用及其影响	89
第五章 秦汉时期实现国家统一的综合准备	92
第一节 发展经济为实施统一战略奠定物质基础	92
一、发展生产为从事统一奠定雄厚实力	93
二、服务于统一大业的主要经济措施	95
三、打击摧毁敌方经济为统一铺平道路	100
第二节 秦汉时期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政治准备	101
一、统一内部的思想	102
二、集中正确的意见	103
三、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104
第三节 实现统一大业的主要军事准备	106
一、发展从事统一战争所急需的主力兵种	107
二、选拔主持统一战争的指挥人才	109
第六章 秦汉时期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运用（上）	111
第一节 正确判断战略形势	113
一、知彼知己，预见胜负	113
二、韬光养晦，固本待机	120
第二节 高明把握战略时机	123
一、“时不至，不可强生”	124
二、“得时无怠，时不再来”	125
三、辩证看待战略时机成熟问题	128
第三节 周详制定战略预案	131
一、统一战略作战主轴线的转变	132
二、战略预案制定上的几个环节	135
三、战略预案的随时应变与充实调整	145
四、整体性战略预案与局部性战略预案	146
第七章 秦汉时期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运用（下）	151
第一节 扎实建设战略基地	151
一、地缘战略背景下的战略根据地选择	151
二、统一战略轴线转移与战略基地的选择	160

第二节 合理选择战略方向	166
一、单纯对峙背景下的战略方向之选择	167
二、多面受敌形势下的战略方向之选择	170
三、高明运用战略手段	173
第八章 秦汉时期统一战争的战略指挥	177
第一节 战略的明确性与战术的突然性	178
一、战略目标的明确性、公开性	178
二、战役行动的突然性、灵活性	180
三、知迂直之计，杂利害之虑	183
第二节 历代统一战争战略指挥的相关原则	184
一、众寡分合，协同策应	185
二、速战速决与持久作战的统一	188
三、“尽敌为上”与统一战争的胜利	193
主要参考文献	196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生存共同体，历史上生活在我国疆域内、属于中央统辖下的各民族政权都是中国内部的地方性政权，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在统一观念的主导下实现和维护中华民族大融合、大一统的历史。自秦统一后的两千多年间，每一次民族对峙、国家分裂之后，最终的结局仍然是民族大融合与新的空前大一统国家的出现。中国战争史的主流是谋求统一的战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发展上的持续性，为世界所仅见，就在于文化认同与国家统一相辅相成。可以说，国家统一的理念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胎记”，是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

当然，完成国家的统一，往往要经历种种坎坷与曲折，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只有运用高明卓绝的智慧，实施巧妙恰当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这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些具有共性的规律，这就是军事斗争的开展和经济文化的融合，此乃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两条基本途径。这中间又以军事斗争为主导手段，包括以军事为后盾的和平统一。统一战略的实施者，一方面做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全方位的准备，先立足于主动优势的地位，把握住国家统一进程的主宰权；另一方面制定正确可行的统一战争方略，以确保实现既定的国家统一的战略目标。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开端，统一战争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争中具有典范意义。在这一时期，曾产生过许多脍炙人口、名垂千古的统一战略谋划，

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作用，诸如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战略，楚汉相争中的韩信对策、萧何献议，光武帝刘秀扎根河北、统一全国的战略，东汉末年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西晋灭吴统一南北的战略等，都是秦汉时期统一战争中的辉煌篇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培育出独具特色、长领风骚的东方兵学。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以尚智贵谋、慎战节武为特征。这种建立在战争反思基础上的军事文化，脱离了厮杀的原始蛮性，达到“知兵非好战”的境界，从而具有哲学智慧的美感。

这一文化价值取向，也使得秦汉统一战争的谋划者，在构筑其战略方针之时，把握“经武之略，在于贵谋”的原则，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全胜”之目的。为此，他们总是力求全面分析战略形势，认真构筑战略方针，恰当确定战略目标，正确选择战略方向，具体规划战略步骤，妥善运用战略手段。这一时期，大凡成功的统一战略都具有一般的共性特征：一是“以文为种，以武为植”，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活动的制约与指导作用。二是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战略形势，高屋建瓴，统筹全局，争取先机；把夺取和掌握战略主动，营造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战略环境作为制定与实施统一战略的出发点。三是在统一战略实施过程中，坚持文武兼用，剿抚结合，刚柔相济；既重视政治攻心、招抚服远，又不放弃强大的武力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用军事手段摧毁敌人的抵抗，达到统一的目的。四是在统一战争的具体战役指挥与战术运用上，强调持久待机下的速战速决；示形动敌，出其不意；轻兵袭扰，重兵突袭，一战而胜。

秦汉统一战争的基本战略特征远远不止于这些方面，以上所举，仅是荦荦大端而已。无可置疑，当时的统一战略是一笔丰富的战略文化资源，有必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其实，古人在这方面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就有总结宋代以前统一战略成败得失的强烈愿望。他曾向学生们表示过，自己“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①。很显然，朱熹是把秦汉

^① 《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统一战略作为他总结历史上国家统一战略运筹与指导经验的重点的。今天，我们当然应该比朱熹有更高的境界来从事这项工作，积极弘扬中华优秀的军事文化传统，深入全面地总结秦汉统一战略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的智慧与启迪。

秦汉统一战略的时代特征



第一节 “大一统”理念与秦汉统一的文化基石

早在先秦时期，随着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大一统”的观念已经初步形成。《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经儒、墨、法等先秦诸子学派的倡导和弘扬，“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到战国末年，在统一条件基本完备的基础上，秦国通过战争这一暴力手段，横扫六合，翦灭六国，实现了统一的政治理想，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而且总是遭到人们的谴责和历史的唾弃。即使是在分裂割据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仍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且以炎黄之后自居。^①又如清统治者也将其入主中原，底定天下看做“成丕业以垂

^① 十六国时期前赵王朝的创立者刘曜，本系匈奴人，却自称黄帝之后。

休万祀者”^①之盛举。而当时的知识阶层，更是突出地流露了盼望统一的心态。如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十六国春秋》、《齐民要术》、《颜氏家训》^②等著作的编撰范围，都不以当时某一小朝廷的统治区域为界，而以“大一统”的国家为准，这明显反映了当时人们要求统一的深切愿望。由此可见，“大一统”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国家在政治上多次分裂，但中华文化不分裂，人们头脑中的大一统理念不分裂，人心不分裂，因此国家终归于统一。这种民族认同心理是柔顺的，然而又是坚强的、不可战胜的。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战略学家的思维与行为方式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一原则的支配，并将这一原则作为争取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一、“大一统”的蕴义

“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在这里是推崇或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③。换言之，“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和颂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即对“一统”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后来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或规模。^④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条在解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时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此处何休所说的“大一统”，指的就是统一的规模与程度，是上述“大一统”的第二层含义。这已经和原义稍有不同，词组由原来的动宾结构变成了偏正结构。但由于后一种理解比较合乎现代汉语语法，所以普遍为今人所接受。其实两者的意思并无根本的区别。

“大一统”所包含的具体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有所丰富发

① 范文程：《入定中原状》，见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元年四月。

② 《颜氏家训》的成书年代，《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等均定为颜之推作于北齐时；今人余嘉锡经过考证，认为当作于隋开皇年间（见氏著《四库提要辨正》）。今仍从通行的看法。

③ 《管子·五行》尹知章注。

④ 参见于汝波：《儒家大一统思想简议》，载《齐鲁学刊》，1995（1）。

展。论者指出：一般而言，其地理概念是指国土统一，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①；其政治概念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即所谓“天下若一”，“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时间概念是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即所谓“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②；其文化概念是指文化习俗六合攸同，仁义德泽流布宇内，即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③，“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仪）行也”^④。到了宋代欧阳修、朱熹等人那里，又将“正统”说纳入“大一统”的理论体系之中，这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书法范例·正统例》中有明显的反映：“凡浑一天下为正统，正统者，大书纪年。继世虽土地分裂，犹大书之。其非一统，则分注细书之。虽一统而君非正系或女主，亦分注书之。”很显然，这是强调“大一统”必须以“正统”或“有德”者为中心，从而设法弥补早期“大一统”说之不足^⑤，使“大一统”理论更好地适应社会政治的现实，满足实施统一战略的需要。

二、“大一统”观念的缘起

“大一统”的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早在殷周时期，这一观念即已开始萌芽：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⑥

维禹之绩，四方攸同。^⑦

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⑧

用于天下，越王显。^⑨

① 《礼记·坊记》。

②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③ 《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

④ 《战国策·赵策三》。

⑤ 参见于汝波：《儒家大一统思想简议》，载《齐鲁学刊》，1995（1）；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序言》，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⑥ 《诗经·玄鸟》。

⑦ 《诗经·文王有声》。

⑧ 《尚书·立政》。

⑨ 《尚书·召诰》。

到了春秋战国，这一思想进入基本定型的阶段。在当时，西周礼乐文明遭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大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称雄，混战绵延，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等，即为此现实之形象写照。人们饱受这一政治无序所造成的苦难，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于是出现了《禹贡》、《左传》所称道的“九州”说，虚拟所谓的黄帝“大一统”，《史记·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想象所谓的夏代“大一统”：“茫茫禹迹，画为九州”^①，“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讖于四海”^②。在“大一统”思想确立过程中，先秦诸子曾发挥过突出的作用，其学说普遍反映了这一社会基本要求。虽然诸子各家在统一的方式和内容上存在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乎一”则是他们的共识。如法家积极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③；墨家竭力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④；道家虽然追慕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但同时也不乏企求一统的愿望，故倡言“抱一为天下式”^⑤。正是由于具备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后来的秦统一与汉统一，才有秦始皇的“行同伦，车同轨，书同文”之举。

当然，真正在“大一统”理论构建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应首推儒家。儒家思想较之于其他诸子思想，在整体上占有较大的优势，其突出的优点是《孔丛子·儒服》中所说的“包众美，兼六义，动静不失中道”。因此在“大一统”思想的构建中，儒家起到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儒家看来，其他诸子各家所提倡的“大一统”，

① 《左传》襄公四年。

② 《尚书·禹贡》。

③ 《韩非子·扬权》。

④ 《墨子·尚同上》。

⑤ 《老子》第二十二章。按：老子所说的“一”，诸家解释多有不同。近人张舜徽的《老子疏证》据帛书甲、乙本改正为“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可见“执一”之义与韩非“执要”意思相近，今从张说。

尽管政治目标正确，但是其实行的方式或途径却是错误的，并不能真正实现。按他们的理解，“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像法家所鼓吹的那样统于暴力，不能像道家所主张的那样统于抽象不可捉摸的道，也不能像墨家所提倡的那样统于纯粹的人格化的天，而必须一统于“仁义礼乐”、“王道教化”，即孟子所说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孔子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奠基者。面对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局面，他一再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抨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他褒扬管仲，着眼点也落在管仲能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维护华夏名义上的统一这一点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①。为此，他提倡“克己复礼”，反对“犯上作乱”，主张重建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将这一“大一统”理念作为微言大义隐寓于自己所整理修订的《春秋》一书之中，遂成为儒家乃至整个古代“大一统”思想的不祧之祖。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②。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存有歧见，不尽一致，即《韩非子·显学》所说的“取舍相反不同”，但对于“大一统”的理念却是一致认同的。如孟子与荀子，一个大声疾呼“（天下）定乎一”，另一个也明确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间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③。在他们和其他儒家人物的努力倡导下，“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

三、《公羊》学的大一统观

在“大一统”思想形成过程中，《春秋公羊传》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一般的看法是：《公羊》学产生于战国时代，当时中国历史正处于由诸侯割据称雄走向全国统一的前夜。《公羊》学作为儒家中接近法家的一派，在思想体系上与荀子相一致，突出地反映了社会发展

① 《论语·宪问》。

② 《韩非子·显学》。

③ 《孟子·梁惠王上》；《荀子·王制》。

的这一趋势，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基本要求，强调“大一统”，主张建立相对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段话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然而由于《公羊》学属于儒家系统，因此它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守旧性与复古性，即在其心目中，并不要求这新的一统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而是主张在旧基础上建立新的一统。于是《公羊》学的“大一统”，其实质便成了天下统一于周的“大一统”。《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云：“然则周公之鲁乎？曰：不之鲁也。封鲁公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曷为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尽管《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它的本质属性是进步的，是属于为中国统一事业的发展而呐喊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它所主张的“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理想境界，为儒家的“一统”观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发展到新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是对先秦诸子“一统”观的总结和升华，是儒家对中华文化、政治日趋成熟的一大贡献，并对秦汉以降中国历史的演变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使“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际。尤其当汉王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这就使《公羊》学作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占据了汉代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公羊》学是儒家“大一统”理论的主要载体，它使这一理论更加系统化、精致化，成为适合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最高政治思想纲领。

汉代儒者继承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重视揭示《春秋》中有关“大一统”的微言大义，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①《汉书·王吉传》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所反映的都是这一现象。然而汉代《公羊》学对“大一统”思想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它做形式上的肯定或推崇，而是对其

^①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内涵做了实质性的丰富，从哲理的层次上对其进行了抽象和升华。关于这一问题，蒋庆先生在其《公羊学引论》一书中曾有比较深刻的阐述：大一统思想的形上含义是以元统天，立元正始，所谓一统，就是要统于元，以元为宇宙万物和历史政治的本体基始；而大一统思想的形下含义则是尊王，建立一统的王道政治，巩固合理而温和的中央集权体制。可见汉代儒者正是从阐发“大一统”思想的形上含义与形下含义的角度切入，使孔子创立的“大一统”观系统化、哲理化和实践化的。如董仲舒就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集中阐述和发挥了“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以及“尊王大义”：

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①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②

这样，就从哲学的高度，即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思想的神圣性与合理性。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同样把“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作为自己宣传、弘扬“大一统”主张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宗旨：“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③

综上所述，“大一统”是中国古代人们的普遍心理认同，其思想存在于先秦诸子的学说体系之中，而以儒家的阐述最为系统而深刻。儒家的“大一统”理论创始人是孔子，他所修订整理的《春秋》则是其“大一统”思想的主要载体之一。在发挥和完善孔子“大一统”思想方面，《公羊》家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注解《春秋》，丰富了“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使之在哲学的层次上得到提炼和升华，从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董仲舒有筌路蓝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按，《春秋繁露》引文据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

③ 《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